

「北派渡海」—— 跨海詞學家在臺灣大學的教學研究及其影響

The Teaching Research and Influence of Cross-Sea Ci-Ologist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陳水雲（Chen Shuiyun）、周含（Zhou Han）*

臺灣光復初期，許多大陸知識分子渡海赴臺。其中有數位北派詞學家任教於臺灣大學。他們不僅為臺灣接續了從中國大陸而來的「北派」詞學傳統，而且還作為大學教授傳播現代詞學理念，培養起一批詞學研究新人，為臺灣光復初期乃至後來整個臺灣的詞學研究事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臺大中文系的初建與北派詞學的輸入

1945年光復以後，臺灣的文學研究格局處在亟待重建的狀態。在這種迫切的需求下，大批知識分子渡海來臺，積極參與到臺灣的文化建設中。

作為戰後臺灣最負盛名的高等學府，臺灣大學更是知識界精英的匯聚之地。臺灣大學（下稱臺大）前身為日本於1928年設立的「臺北帝國大學」，1945年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接收後改制更名，並依中國學制將原來文政學部改為文學院與法學院。文學院下設中國文學（以

下簡稱中文系）、歷史、哲學三系，中文系由此正式成立。臺大中文系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師資薄弱，從中國大陸渡海來臺的知識分子為中文系的建設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6年起，相繼有許壽裳（1883-1948）、喬大壯（1892-1948）、臺靜農（1902-1990）等中國大陸學者來臺講學，中文系乃得接續大陸中國文學系之學術傳統，特別是來自於北京大學的學術傳統。

作為在大陸便享有盛名的「詞壇飛將」，¹喬大壯於1946年受許壽裳之薦渡海來臺，任臺大中文系詞學教授。喬大壯，原名曾劬，字大壯，號波外居士，幼承家學，尤長於詞，才華早露。十四歲作〈河滿子〉二闕，為朱祖謀所稱賞，稱其為詞界傳人。²1935年他參加了「如社」，與吳梅、陳世宜、蔡嵩雲、汪東、向迪琮、唐圭璋等時相唱和，有作品收入《如社詞鈔》。抗戰時期曾任重慶中央大學師範學院詞學教授。1948年2月許壽裳逝世後，他曾短暫接任臺大中文系主任一職，不久卸任，返回中國大陸，同年7月3日在蘇州投水自盡。

* 陳水雲，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周含，武漢大學文學院研究生。本文為中國社科基金專案「海峽兩岸中華詞學發展史（1945-2018）」階段性成果。

1 唐圭璋，〈回憶詞壇飛將喬大壯〉，喬大壯，《喬大壯手批周邦彥片玉集》（濟南：齊魯書社，1985），附錄。

2 黃墨谷，〈先師大壯先生遺事〉，喬大壯，《喬大壯手批周邦彥片玉集》，附錄。

喬大壯有詞集《波外樂章》四卷傳世，關於詞學論著有〈手批周邦彥片玉集〉一稿，為其學生黃墨谷所保存，其中有論及「境界」問題的批語和作品點評。喬大壯認為詞以「時」與「地」合而為境界，並藉周邦彥詞闡發境界的意蘊。他以結構觀點「補足王國維之境界說，最為警策」。³ 喬大壯在臺大任職時間雖短，相關授課資料如今也不易見，但作為首位在臺灣傳授中國詞學之人，他為臺大中文系開啟了詞學教學和研究的新方向，也為臺灣詞學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48年8月，著名的未名社作家臺靜農出任臺大中文系主任，他接續許壽裳的辦學思路，將早年北京大學（下稱北大）的學風引入中文系，在力求避免來自官方政治干預的同時，特別著意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精神和學術自由的風氣，使得臺大中文系一掃保守作風。

第一，先後邀聘洪炎秋（1899-1980）、戴君仁（1901-1978）、鄭騫（1906-1991）等人為教授，其中洪炎秋、戴君仁皆出身於北大，鄭騫亦畢業於燕京大學（下稱燕大），這時臺大中文系初具北大中文系學風。第二，在課程設置、師資引進上也令人耳目一新，不僅開設了有關現代文學的課程，而且不拘一格引進人才，在校園內外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氛圍。

臺靜農早年曾以剛畢業學生的身分，被陳垣聘為輔仁大學講師，與諸多學界名流同堂共事，這讓臺靜農感慨「當然是我的幸運」。所以，他在臺大中文系主持系務時，也聘請了年輕學者葉嘉瑩為教師，原因是「看了她所作的舊詩詞，實在寫得很好。我們系裡需要一位真能作舊詩的先生來教詩選，就請了她」。⁴ 不出其所料，葉嘉瑩到臺大以後大受學生歡迎。這也是自蔡元培執掌北大以來的優良傳統，老一輩學人提携後進的風範讓臺靜農感懷不已，因此在他任中文系主任期間，極力主張

任人唯賢，並營造了重視人才、學術至上的風氣。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自由、開闊包容的良好氛圍之中，從中國大陸跨海來臺的知識分子才得以在臺大中文系紮根散葉。在詞學研究領域，受臺靜農邀聘，鄭騫與葉嘉瑩相繼在臺大任教，傳播了由中國大陸而來的學術理念，臺大中文系的詞學教學與研究也得以蓬勃發展。

在臺大較早從事詞學研究的有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1897-1984），⁵ 他曾在臺北帝國大學任教長達十年（1929-1934，1940-1945），在任期間，曾在《臺大文學》第5-9卷連續刊載《本邦填詞史話》（1-11），後為李圭海翻譯為《日本填詞史話》連載於龍榆生主編的《同聲月刊》第3卷1、8號（1943.3、10），是否開設過詞學課程則不得而知。

臺大中文系成立後，比較系統講授詞學課程、指導學生的是鄭騫。鄭騫是20世紀30、40年代就已活躍在中國大陸詞壇的學者，早年求學於燕大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燕大中文系承襲的是北大傳統，「課程範圍、研究方向，以及純文學、文字聲韻、學術思想三方面的分配情形，大致與北大中文系相同」，⁶ 北大文史名宿也多來燕大兼課。鄭騫還曾於1942年應周作人之邀，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講授「詩選」、「詞選及詞史」、「古詩源」等課程。1948年秋，鄭騫應臺靜農之邀赴臺，任臺大中文系教授，在臺大任教三十餘年，期間先後開設講授了「蘇辛詞」、「柳周詞」、「東坡詞」、「詞選」、「詞曲專題討論」及「詞史與詞律」等有關詞學的課程。據林文月回憶：「鄭騫先生著有《從詩到曲》一書。他在系裡所開課程正涵蓋了詩、詞、曲等廣大的古典文學領域」。⁷ 鄭騫的詞曲學大體沿王國維一脈發展，也間接受到吳梅曲學思想的影響。「他雖然沒有直接師從吳梅的機會，但曾向許之衡學習過詞曲，而

3 黃坤堯，〈喬大壯境界說析論〉，《詞學》2012.2: 205。

4 柯慶明，〈那古典的光輝——思念臺靜農老師〉，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頁210。

5 據神田喜一郎〈憶王靜安師〉（載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319-321），他的父親與羅振玉、內藤湖南是故交，當時羅振玉與王國維流亡日本，他因此得以結識王國維，後來（1922）他居上海期間，與王國維有較為密切的接觸。但自1911年以後王國維的治學方向已轉向經史之學，神田喜一郎研治日本詞學是否受到王國維的啟發亦不得而知。

6 鄭騫，〈燕京大學中文系〉，陳明章編，《私立燕京大學》（臺北：南京出版公司，1982），頁16。

7 林文月，〈在臺大的日子〉，《回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頁52。

許之衡曾師事吳梅，兩人在曲律方面志趣相投。鄭騫在治學過程受到過吳梅的影響和啟發，對其治學的得失也深有體會。⁸《從詩到曲》以《景午叢編》和《燕臺述學》為基礎選編，主要收錄了鄭騫早期寫作的論文，從中不難看出其遙契之精神。

葉嘉瑩（1924-）在中國大陸時就讀於輔仁大學國文系，攻讀古典文學專業，受教於著名詞曲家顧隨。此時葉嘉瑩熱衷詩詞寫作，得到顧隨的特別賞識，並寄予厚望，這堅定了葉嘉瑩從事古典詩詞研究的信心。她晚年回憶恩師講課時說：「先生在課堂講授中，所展示出來的詩詞之意境的深微高遠和璀璨光華，則更是使我終生熱愛詩詞，雖至老而此心不改的一個至要的原因。」⁹對於顧隨的詞學，葉嘉瑩評價道：「羨季先生的講授，則開闊和提高了我對詩詞之評賞與分析的眼光和境界。先生對詩詞的感受之銳、體會之深，其靈思睿智，就我生平閱讀交往之所接觸者而言，實更無一人可相倫比。」¹⁰1948年11月，葉嘉瑩隨夫遷居臺灣。顧隨特意寫信介紹她去拜會自己的幾位朋友，臺靜農、李霽野和鄭騫，託他們照顧這位得意門生。¹¹1954年秋，葉嘉瑩受許世瑛和戴君仁的推介，被聘為臺大中文系教授，講授古典詩詞，至1969年秋離開臺大，前後在臺大授課十五年之久。

渡海來臺的知識分子大多在中國大陸時期就已經形成自身的知識體系，而在臺大任教的跨海詞學家在中國大陸又有著共同的詞學淵源，那便是北派詞學。20世紀詞學界存在兩個不同的學術流派，即以朱祖謀、況周頤為代表的側重音律一派和以王國維、胡適為代表的側重意境一派。不同的學者對其有不同的命名，早在20世紀30年代查猛濟曾將其命名為「朱況派」與「王胡派」，90年代後期胡明又將其命名為「體制內派」與「體制外派」，劉揚忠則把這兩派稱為「傳統派」和「新派」。

以上命名各有優長，但或有不準確處，或含有褒貶

之意，有先入為主之嫌。當代學者曾大興主張從地域角度，將其命名為「南派詞學」與「北派詞學」，一則根據兩個流派代表人物從事詞學活動與詞學研究的主要地域，二則根據他們詞學代表作產生的地域，同時考慮詞學家的師承關係或他們接受的詞學影響，因此較為中性客觀。「北派詞學」的代表人物為王國維和胡適，重要成員則有胡雲翼、馮沅君、俞平伯、浦江清、顧隨、吳世昌、劉堯民和繆鉞等。北派詞學家大都以王國維《人間詞話》為共同思想淵源，並以北京大學為其發源地傳播思想。

在詞史觀和詞體觀方面，北派詞學家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在知識結構、學術背景、研究方法以及詞學成果的表現形式等方面，也有許多相通之處。與南派詞人推崇「重、拙、大」不同，北派詞人講求「意境」、「情感」，推崇真實、自然的詞風，反對在格律上斤斤計較。他們多持進化的文學史觀，論詞大都推崇唐五代和北宋，不滿南宋及以後的詞，但比較欣賞辛棄疾詞。北派諸人欣賞辛詞，但並不都欣賞其豪放。如王國維欣賞辛詞「有性情」、「有境界」；胡適欣賞辛詞「才氣縱橫，見解超脫，情感真摯」，且多用白話；顧隨欣賞辛詞「雅量高致」。北派諸人治詞目的不在「尊體」，或是「昌明詞道」、「詞的中興」，他們治詞常出於一己之興趣喜好，而且他們文史兼修，學貫中外，視野開闊，注重借鑒西方文論，將西方美學、文藝學觀點與方法引入傳統的詞學研究。這也使得他們的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擴大了詞的社會影響，從客觀上達到了「尊體」的效果。在研究方法上，北派詞學家較為側重文本賞析，成果多以詞作的藝術鑒賞與評價、詞人詞論的探討和詞史的研究為主。鄭騫在中國大陸時就接受了王國維及北派詞學思想影響，葉嘉瑩更是顧隨所培養的詞學傳人，二人均具有北派詞學的思想淵源。因此，在他們渡海來臺後，為臺大的詞學研究輸入了自北大而來的北派詞學傳統。

8 苗懷明，〈既欲求真實 甯復計辛苦——由鄭騫《從詩到曲》一書所想到的〉，《讀書》2016.11: 84。

9 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前言〉，《迦陵雜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324。

10 葉嘉瑩，〈顧隨先生《詩文叢論》序言〉，《迦陵雜文集》，頁155。

11 葉嘉瑩，〈懷舊憶往：記臺大的幾位師友〉，《迦陵雜文集》，頁30。

二、跨海詞學家在臺大的教學與研究

如上所言，作為臺灣第一所設立中文系的現代大學，臺大接續了來自於北京大學的學術傳統和教育理念，也為臺灣播下了詞學研究的新「種子」。而作為現代大學的中文系教授，渡海而來的詞學家不僅在課堂上傳授詞學知識，還通過各自的詩詞創作和教學藝術，為學生營造情境，使其情感與作品達成共鳴。正是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北派詞學觀念在臺大中文系紮下根來並傳播開去。

有別於傳統教育的大量灌輸，現代大學的教育理念是教人以讀書的態度與方法，培植健全的人格，讓青年學子養成正確的人生態度和社會認知。老師在課堂上扮演的更多是引導者的角色，這也是現代美育思想在文學教育上的具體體現。「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敏銳之性靈，養成高尚純潔之人格。」¹² 美育觀念在現代文學教育中的實踐和應用，不僅是對傳統「詩教」觀的突破和反叛，更對傳統詞學的現代轉型具有極大的推動促進作用，使得詞學研究的格局更為宏闊。

詞至清代號稱中興，清人在創作意識上雖認定詞之幽隱細微的美學特徵，卻將它視為與「詩」同源同質的文體，還將諸如「六義」、比興寄託、興觀群怨、風騷雅正、溫柔敦厚等儒家詩教思想引入詞學，試圖以詞體展示傳統詩歌所表現的社會大問題、大意義，達到「濟用」、諷喻之效果。例如朱彝尊說「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哇，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元音」，¹³ 張惠言說「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¹⁴ 劉熙載說「詞之興、觀、群、怨，豈下於詩哉！」¹⁵

然而，進入五四以後，隨著西方新思想的大量引進，中國文學思想也有了重大的變化。在胡適等現代學者看來，文學雖是有所為而為之的，但「其所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為而為之，美感之外，兼及濟用。其專主濟用而不足以興起讀者文美之感情者，如官樣文章，律令契約之詞，不足言文也。」¹⁶ 對於詞而言，王國維說：「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¹⁷ 他重新定義了詞的價值，以現代的「真」代替古代的「善」，認為詞之美表現在情感的真摯、意境的深邃、語言的清新，而非道德教化。在他們的影響下，像俞平伯、顧隨、繆鉞、浦江清等北派詞學家對於詞的認識也同樣如此。「他們對於詞的關注，由教化轉向美感，由重寄託轉而尚情趣，這表明現代學者在文學教育觀念上的重大進步。因此，在大學課堂上對於詞的傳播和講授，他們關注的重心也由過去講究微言大義轉向對情感的調動和意境的揭示。」¹⁸ 跨海詞學家在臺大的詞學教學也發揚了自北派詞學而來的現代文學教育理念，以不同的授課風格和多樣的講課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師生之間達成了情感上的共鳴。

許多學生回憶起鄭騫在臺大講課的情景，描述他的講解是如何引人入勝，啟發他們進入詩詞的美境，讓他們產生情感的共鳴。據林文月回憶，「鄭（騫）先生耳重，但我記得很牢，在課堂上他曾經同我們講起聽到冬夜雪花飄落積雪上的聲音，並且還用手勢和聲音做逼真的摹描。我那時怎麼也不肯當真，但現在我寧信敏銳的文人藝術家恐怕是天生另有一副心靈的耳朵，那種耳朵是聽得到雪花飄落的聲音的。」¹⁹ 又如沈謙回憶鄭騫講蘇辛詞時曾向學生提出這樣一種說法：蘇東坡是北宋四川眉州眉山人。相傳東坡出生之後，四川眉山的草

12 蔡元培，〈創辦國立藝術大學之提案（摘要）〉，《蔡元培美學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頁 69。

13 朱彝尊，〈靜惕堂詞序〉，施蟄存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 543。

14 張惠言，〈詞選序〉，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617。

15 劉熙載，〈藝概·卷四〉，劉立人、陳文和編，《劉熙載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 145。

16 胡適、曹伯言，《胡適日記全編》第 2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 239。

17 王國維著，徐調孚註，王幼安校訂，《人間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頁 1。

18 陳水雲，〈有聲的詞學——民國時期詞學教學的現代理念〉，《文藝研究》2015.8: 67-68。

19 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頁 200。

木都逐漸枯萎了。因為蘇東坡才情太大，天地間的日月光華，靈氣所鍾，薈聚一身，山川的靈秀都被東坡吸光了。直等到蘇東坡逝世之後，眉山的草木才恢復了青蔥。鄭騫問同學們是否相信。當時，「在一片愕然之中，有少數同學舉了手。老師莞爾而笑：『純真的孩子，你們真是傻得可愛！』當他再說：『不相信的請舉手！』當時大部分人都表示難以置信。不料鄭老師面露詭譎的笑容說：『可憐的孩子，不相信的更傻！讀蘇辛詞，如果不能物我交融，與天地萬物靈氣相通，如何能融進詩人所營造的情境與氣氛呢？』」²⁰作為大學教授，鄭騫在傳授知識時，或「以手勢和聲音做逼真的描摹」，或以風趣幽默的方式來啟發學生，這樣就在知識層面之外，營造出一種有聲有色的情境，使他們從情感角度達成共鳴，從而加深對作品意境的理解。

臺灣作家陳映真曾在上個世紀 50 年代在臺大旁聽葉嘉瑩講課，他將葉嘉瑩與臺靜農和鄭騫二人的課對比來評論：「兩位老教授的課，是博學鴻儒講解古典的堂奧，有不少地方，也不是一個素來沒有國學根底的外語系學生所能理解的。相形之下，葉嘉瑩教授的每一堂課，幾乎都令人感到永遠新奇的審美的驚詫。」²¹據臺大教授張健回憶，一位歷史系校友曾對他說：「聽葉先生的課，真是一種享受，往往一字一句，自有魅力，更加風致高雅，令人久久難忘。」又有俞大綱也向他提到：「她教詩詞，深入淺出，各方面兼顧，義涵、聲律、境界都說到了。」²²

葉嘉瑩是顧隨的詞學傳人，她的詩詞評賞也深得顧隨真傳。葉嘉瑩回憶顧隨的教課方式「是純以感發為重，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觸過的講授詩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於啟發性的一位難得的好

老師。」²³顧隨課堂講授的旁徵博引，興會淋漓，給人以心靈的感發與啟迪。葉嘉瑩也繼承和發揚了這樣一種教學風格。她講課極其生動詳盡，善於旁徵博引啟發學生。據聽過她講課的學生回憶，葉嘉瑩擅長一種「跑野馬」的講課方式，能使人「跟著她馳騁於古今中外的文學領域中，深交詩靈文魂於千古，探究其慷慨幽微之情志。」²⁴葉嘉瑩認為詞與詩不同，最初不以言志為主，而往往是作者心靈本質的流露，因此在評賞詞作時「應當以感發之生命在本質方面的價值為主，而不應只著眼於其外表所敘寫的情志。……這種看法，直到今日我也未曾改變。」²⁵葉嘉瑩早期詩詞賞評承王國維《人間詞話》及其「境界說」，又從中領悟得「興發感動」的力量，至今評說講述詩詞都常帶有一種心靈與感情的感發之力量。「當我得出此一結論之後，再對前期所寫的那些批評文字一加回顧，便發現不管我立論之是否完全正確，然而至少有一點我是可以自我告慰而無愧的，那就是我是認真地探求著詩歌中這種興發感動的生命，而且誠實地說出了自己的感受。」²⁶這也是她詞學教學的一大特色。

葉嘉瑩自 1954 年至臺大任教，隨後在淡江文理學院以及新莊的輔仁大學兼課，同時教三所大學，講授「詩選」、「詞選」、「曲選」、「杜詩」、「歷代文學」等多門課程。此外，她還代替許世瑛在臺灣教育廣播電臺擔任「大學國文」課，其聽眾之多元，授課量之眾多，使其名廣為人知。據楊文菲回憶：「我沒課，就跑去旁聽，一進教室，只見擠滿了人，心想中文系怎麼有這麼多學生。後來才知道，很多都是外系學生去旁聽的，我連去了幾次，都是座無虛席……可見她講課的吸引力。」²⁷

20 沈謙，《林語堂與蕭伯納——看文人的妙語生花》（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9），頁 25-26。

21 陳映真，〈四十五年前的朱批〉，張紅編，《葉嘉瑩教授八十華誕暨國際詞學研討會紀念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頁 258。

22 張健，〈四十年春風往事〉，張紅編，《葉嘉瑩教授八十華誕暨國際詞學研討會紀念文集》，頁 316。

23 葉嘉瑩，《紅蕖留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頁 65。

24 陳小玲，〈真善美的饗宴四十年〉，張紅編，《葉嘉瑩教授八十華誕暨國際詞學研討會紀念文集》，頁 257。

25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5。

26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後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356。

27 楊文菲，〈緣起八卦山下〉，張紅編，《葉嘉瑩教授八十華誕暨國際詞學研討會紀念文集》，頁 306。

作為現代大學的詞學教授，鄭騫、葉嘉瑩在詞學教學過程中，通過多樣的授課方式調動學生情感，呈現詞之美感與意境，從而也使其詞學思想更好地得到傳播。此外，除去臺大詞學教授的身分，他們本身又是頗具影響力的詞學大家，學術研究也是其詞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他們承接中國大陸詞學傳統，另一方面在入臺以後隨著時地變遷、人生經歷又有新的發展，因此其詞學思想及學術研究也分為不同階段。應該說，中國大陸時期的良好教育和學術鍛煉，為他們入臺以後的教學和研究提供了充足的養料，臺大的教學活動則成就了他們的學術地位。

鄭騫的詞學研究在中國大陸時期已初具規模，撰有《珠玉詞版本考》、《稼軒詞版本考》、《辛稼軒先生年譜》、《稼軒詞校注》等，體現出考據、義理、詞章並重的特色。對於詞家作品之賞析及詞史發展也頗為重視，構建出以溫韋、柳蘇、周辛等相對詞風為主線的簡要詞史觀，這是受到王國維、吳梅、許之衡等影響的結果。跨海赴臺大任教後，鄭騫基本上沿著早先詞學的路徑發展，將在中國大陸時期所作的幾篇作品修訂發表，對詞家的若干看法較之中國大陸時期也有所修正（詳參〈成府談詞〉）。

鄭騫入臺後撰有多篇論詞文章，用語簡要精當，辨析細緻明瞭，集中體現了其詞學思想。比如對詞體特質的討論，通過比較詩詞曲之異同，分析了詞體特質形成的因素。在他看來，詞曲是能配樂歌唱的，組成的文字、音聲、風格與詩相異。而詞曲在內容上雖都偏於清俊秀美而少莊嚴雄厚，但詞更具有中國文化的陰柔美，詞的這一美感特質與詞調多為單雙句組合、音律和諧以及作詞所用語彙集優美多於壯美、婉約含蓄有關。由此從體調形式上確立了詞的體式。對於詞的正變說，鄭騫認為詞以婉雅為正，以豪放為變。雖有正變，卻不以此論價值高下，二者風格不同，各有千秋，無分軒輊。除此之外，鄭騫還借由《詞選》與《續詞選》的編纂和修改，自唐宋而迄明清，兼收各種風格詞人，「分列為成

家與不成家二類，貫串系統，臧否得失，建構了更為完整的詞史輪廓。」²⁸在鄭騫看來，詞萌芽於中唐時期，婉約與豪放二派源出溫韋，從柳周到南宋中葉是詞真正成熟的時期，吳文英與張炎，前者深婉，後者清空，乃詞三百餘年之極盛，往後便盛極而衰，從元中葉走向衰落，再至明朝終於衰弱到極點。這一觀點，雖然總體上是胡適詞史三段論的承續，但肯定了吳文英和張炎，較之北派詞史觀有了較大的發展。除了對詞家詞作的欣賞分析和詞史的研究，鄭騫在詞的考證之學上亦有所成就，他所撰陳師道、陳與義、辛棄疾等年譜鑒別精當，至今仍具參考價值。

較鄭騫而言，葉嘉瑩在中國大陸時期未有詞學著述，入臺任教以後才逐漸形成系統的詞學研究方向。在此期間發表的論詞單篇論文，在1970年集結成冊由臺北純文學出版社匯總為《迦陵談詞》，這也是葉嘉瑩談詞的第一本書，從中可見其早期詞學思想。這一時期葉嘉瑩尚未明顯受西方文論影響，在語言表述上保留著從淺近文言向白話過渡的痕跡，此書從王國維《人間詞話》的三種境界談起，繼而評析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晏殊和吳夢窗等各位詞人詞作之風格。

據葉嘉瑩自言，撰於1956年的〈說靜安詞「浣溪沙」一首〉是其首篇詩詞評賞之作，這篇文章純任主觀感發，尤重文字美感，並模仿王國維之風格。1958年，葉嘉瑩又發表了〈溫庭筠詞概說〉一文，自此逐漸從對作品的評賞轉入對文學理論的研討，此時葉嘉瑩還未以「要眇宜修」作為論詞標準，但文中某些觀點看法已初步奠定其後詞學理論的基礎。葉嘉瑩認為溫庭筠詞之特色有二，即多客觀之作，多純美之作。純美即純粹之美，「但表現於顏色、線條、聲音諸元素之和諧的組合中，而不牽涉任何意義者也。」²⁹因之不受意義拘束，所以更易引發讀者聯想。這種純美的詞作，若內含著足以引發言外無窮之感發與聯想的一種幽隱深微的本質，便是「有境界」的好詞。溫庭筠詞便是以明物、色澤、聲音等喚起人的純美之感，不必苛求其文通意

28 劉少雄，〈鄭騫先生的詞史觀〉，《詞學文體與史觀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10），頁288。

29 葉嘉瑩，《迦陵談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31。

達，不必有深意。葉嘉瑩在此時期接承大陸北派詞學思想，論詞重主觀體會，重感發聯想，重意境呈現。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北派詞學家對夢窗詞的輕視，葉嘉瑩不僅發掘了夢窗詞「極高遠之志、窮幽黯之美的新境界」，³⁰還闡釋了其在運筆修辭上的現代性特徵，主張以感性去體認其中蘊蓄的豐美，對夢窗詞的賞析別具一格。據學生回憶，葉嘉瑩所著《迦陵談詞》一經出版，當時臺灣青年學生幾乎人手一本。後來又多次再版，臺灣三民書局和中國大陸三聯書店都有重版，其影響力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臺靜農雖不以治詞見長，但早年在《小說月報》上也發表過〈宋初詞人〉的專題論文，論及晏殊、歐陽修、柳永、張先四位，把他們與初唐四傑相比，對他們的淵源、詞風、影響有比較細緻的分析，認為他們為宋詞開闢了新道路。在臺大任教幾十年，長期講授「中國文學史」，新近有何寄澎等整理的《中國文學史》講稿出版，其中第六編第三章論述宋詞，追溯了詞的起源，討論了詞的形成過程，論析了唐五代詞、《敦煌雲謠集》、宋詞作家，篇幅雖然簡略，但對於唐宋詞也發表了他獨到的見解，如稱詞是一種新體詩，花間詞接受了正統文學與民間文學的雙重影響，柳永不是民間作家卻從民間吸收營養，蘇軾填詞雖不盡協律卻為宋詞開了新局等等，看法雖然平實，卻能自抒己見，並見出其對北派詞學思想的傳承。

三、臺大詞學研究特色及學術傳承

雖然在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神田喜一郎開了詞學研究的先河，但現今臺大的詞學研究傳統大多是由跨海詞學家從中國大陸帶過來的，受北派詞學影響較深，其治詞方法和詞學思想也展現出一些共性的特點。

其一，是對文學史的關注和詞史發展脈絡的梳理。受王國維及胡適影響，北派諸人多持進化論詞史觀。在這一點上，臺靜農從文化發展與時代思潮的角度，探討了詞與諸宮調的起源與性質，認為詞形成原因是「選詞

以配樂」和「由樂以定詞」。在宋詞部分，所選作家也以北宋為主，南宋詞家僅列辛棄疾一家。北派諸人論詞多推崇唐五代和北宋詞，不推崇南宋及其以後的詞，惟有辛棄疾一人例外。葉嘉瑩對於唐五代詞和北宋詞也同樣看重，她從《人間詞話》對溫韋馮李四家的評價出發，撰文著力分析四家詞的風格及晚唐五代時期詞在意境方面的拓展，還稱賞晏殊之詞，並有專文評賞王國維「浣溪沙」，南宋惟吳文英一家。鄭騫對詞史發展的重視不僅體現在詞選的編集上，也集中體現在他的專篇論文中。他以婉約（正）、豪放（變）為分流發展的主軸，並以八位關鍵性詞人，串聯構建起結構完密、脈絡清晰的詞史譜系：以溫韋二人詞的創始，柳蘇代表詞的發展，周辛為詞中二聖，詞至南宋到達極盛，吳文英與張炎及其他諸家共同完成婉約豪放體系的構建，發展為元初的南北兩派，最終衰於明而振興於清。

其二，是對於詞之「意境」的重視。王國維論詞標舉境界，實際上是標舉真實與自然，即為有境界之作。其內容是真實的，有真景物，真性情；其形式是自然的，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柔裝束之態。以「境界」評詞，重真實，尚自然，這在葉嘉瑩與鄭騫詞論中隨處可見。如鄭騫評溫庭筠詞：「融情入景，意與境渾」，又稱二晏同調〈臨江仙〉「不僅調譜相同，情感意境亦同」、「柳詞意境雖比前人弘闊，本質無大異」等。葉嘉瑩更是以「境界」說作為分析詞人詞作的理論工具，如以三種境界說談古代詩歌的欣賞，以《人間詞話》對溫韋馮李四家的評價，論述晚唐五代時期詞在意境方面的拓展，又以「詩人之境界」與「常人之境界」論王國維的〈浣溪沙〉等。從這可以看出臺大詞學與北派詞學一脈相承之處。

其三，是對王國維極為推重。北派詞學以《人間詞話》為其思想之淵源，臺大跨海詞學家不僅論詞評詞多引王氏之語，詞論方面也有對王氏思想的深入研究。鄭騫〈成府談詞〉對歷代詞人的品評，多以《人間詞話》之相關評價為立論之依據，如論歐陽修、晏幾道、賀鑄、辛棄疾詞都引用了《人間詞話》的相關

30 葉嘉瑩，《迦陵談詞》，頁162。

評價。「鄭騫或許可算是王國維文學批評事業的最重要的繼承者……他像王國維一樣，一面討論作品的精神風貌，一面從事各種版本體式格律的考據。」³¹ 至於葉嘉瑩走上詩詞研究的道路更是與王國維《人間詞話》的啟迪密不可分，早在 50 年代末期，她的第一篇研究論文就是〈由《人間詞話》談到詩歌的欣賞〉，這為其之後一系列探討《人間詞話》的論著奠定了起步的基石，在 70 年代更完成《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的專書。臺靜農《中國文學史》對於五代北宋詞人的評價，也多次徵引王國維《人間詞話》、俞平伯《讀詞偶得》，甚至鄭騫的有關論說。當然作為教材也適當地吸收了況周頤、龍榆生、夏承燾等人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他們有關詞人生平考證的成果。

跨海詞學家從中國大陸帶來的北派詞學傳統，不僅紮根於臺大，還傳播影響到了其他高校，乃至於整個臺灣。這種影響與傳播和詞學家本身的詞學活動密不可分。這些跨海詞學家不僅在臺大任教講學，往往還在臺灣其他大專院校兼任或者講學，從而有了更廣範圍的傳播受眾。上文已提及，葉嘉瑩同時在臺大、輔仁、淡江三校任教，每週要上的課多達七、八門，除此之外有時還兼淡江夜間部的一門課，以及在臺灣教育廣播電臺擔任的「大學國文」課。而鄭騫在臺大任教更達三十餘年之久，1974 年自臺大中文系退休後，改以兼任教授名義繼續指導博士論文，又轉任東吳大學及輔仁大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至 1991 年辭東吳大學、輔仁大學講席，時間也長達十餘載。因此，這些高校的詞學教學內容和體系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臺大詞學研究傳統的影響。此外，這些跨海詞學家在臺灣教書育人，引導著一大批學生走上有志於詞學研究的道路，為臺灣培養了詞學研究的傳人。

眾所周知，大專院校學生的關注和研究領域，往往受到指導教師的影響。受這些跨海詞學家指導的學生，在論文選題和研究方向上自然地承接了其師之思想，並發揚北派詞學傳統。以鄭騫所指導的碩博士研究生為例，其學位論文關注領域大多集中在蘇辛詞、宋詞及詞

論研究上。在臺大指導的博士論文有梁榮基「詞學理論綜考」、林玫儀「晚清詞論研究」，碩士論文有陳淑美「稼軒詞用典分析」、吳宏一「常州派詞學研究」、李小萱「蔣春霖及其水雲樓詩詞」、林玫儀「敦煌曲研究」、崔瑞郁「柳永與周邦彥」；在其他高校指導的博士論文有徐信義「碧雞漫志校箋」（臺灣師範大學）、張夢機「詞律探原」（臺灣師範大學）、任日鎬「宋代女詞人研究」（政治大學）、黃文吉「宋南渡詞人研究」（東吳大學）、王偉勇「南宋詞研究」（東吳大學）等。這些學生在走上學術研究道路後，其研究領域和治學路子也不免受其師承的影響，如吳宏一有《清代詞學四論》、徐信義有《詞學發微》、林玫儀有《詞學考詮》、黃文吉有《北宋十大詞家》、王偉勇有《詞學專題研究》等。

由此，這些跨海詞學家的詞學教學，從時間和空間上都對臺灣詞學研究的走向產生了較大影響。自光復至 20 世紀 80 年代，臺灣的詞學研究，大都偏重於通論及詞史方面，或作家作品方面，集中於晏、歐、柳、周、蘇、辛等大家；詞論方面，以王國維及其《人間詞話》研究為主流方向。至於詞樂、詞調、詞譜、詞韻方面，或是偏於語言學，或是偏於音樂學，著眼於詞學研究的成果較少。臺灣詞學研究內容的這種偏向，也是中國大陸北派詞學研究的重要特色。

由這些跨海渡臺詞學家培養出的學術傳人，先後進入詞學研究領域，分別任職於臺灣各大專院校，逐漸成長為臺灣詞學研究的中堅力量，成為新的一批詞學研究者和思想傳播者，從而在更廣的範圍對臺灣詞壇產生了影響。以鄭騫為例，指導的學生如吳宏一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後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林玫儀曾任職於淡江大學文學院，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黃文吉任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暨國文系教授；王偉勇任職於成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張夢機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徐信義任職於臺灣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後轉任慈濟大學東方語文系教授。至於其詞學成就，則在文獻清理、作品闡發、詞史敘述發掘、理論探討及跨領域詞學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貢獻。以目

31 柯慶明，《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頁 95。

錄研究為例，近年臺灣所編全面著錄詞學資料之目錄，要推黃文吉編《詞學研究書目》（文津出版社，1993）及林玫儀主編《詞學論著總目》（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後者之〈詞學總論〉「所收均為與詞學理論有關之論著」，「共分二十目：綜述、特質、起源、流變、派別、內容、風格、意境、體制、結構、詞調、詞與音樂、詞與舞蹈、詞譜、詞韻（韻部、韻書）、格律、技巧、詞論、詞話（包括論詞的詩詞）、學詞法及鑒賞等」。³²分目較之以往學者的劃分體系更為詳細。此二書所搜資料均包括專著及單篇論文，範圍遍及海內外，是臺灣詞學整理工作的重要成果，為全國乃至世界的詞學研究者提供了詳實可靠的資料索引。林玫儀與吳熊和、嚴迪昌合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此書為兩岸學者合撰，輯錄中國大陸、臺灣及海外重要圖書館之清詞別集書目，釐清版本同異，為詞學研究者按目求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最近由王偉勇編著的《中外詞學碩博士論文索引》是一部專就碩、博論文而編製的目錄學文獻，對於數量龐大、收藏在各高校圖書館、未能公開出版的學位論文第一次作了系統編目，收錄從1935年到2011年，近76年間世界各地大專院校學位論文共2,560筆。「此書編輯的目的，主要在提供研究生於選題之際，能夠了解中外學者在某議題上已有的創意，以及

未經探究的論點，俾使後學者繼續開發，也可避免未出新意而撰寫相同議題之缺失。」³³由此可見，由臺大跨海詞學家培養出的詞學傳人，對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詞學研究作出的突出貢獻，他們已經成長為對臺灣詞壇影響不可小覷的力量。

從20世紀40年代末跨海赴臺的詞學家，到其培養出的新一代詞學研究者，可以看到推動臺灣詞學研究發展的主體力量是大學教授和由他們指導的研究生。自60、70年代以來，臺灣的詞學研究能得以不斷壯大，蓋因有這樣的學統傳承，代代相續，並不斷推陳出新，把由渡海而來的北派詞學傳統發揚光大，或借鑒南派詞學研究的優長，或融入西方理論以詮釋傳統詞學，在總集的整理或校訂、詞論的整理或闡釋、詞樂及韻譜的研究、作品的研究或考訂、名作的選注或賞析以及論詞資料如詞話序跋、評點、論詞詩詞等方面，尤其是研究工具的編製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業績。

縱觀臺灣詞學研究的發展，從百廢待興到如今成為當代中華詞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40、50年代的跨海詞學家們的功勞不可忽視。他們由中國大陸跨海至臺大教書育人，使得中國大陸詞學觀念在臺灣師範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等高校傳播發揚起來，同時他們還培養了一批詞學研究的新人，為臺大乃至整個臺灣現代詞學研究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32 林玫儀，《詞學論著總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凡例，頁13。

33 王偉勇，《中外詞學碩博士論文索引》（臺北：里仁書局，2015），述評，頁2。